

足。

参考书目：

吴泽霖，《美国人对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的态度》，

布迪厄理论摘引自《国外社会学》1994年第5期，31-32页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95硕士生 郭建如）

【调查报告选载】

编者按：1994—1995年，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承担了合作研究课题“中国教育的区域发展”，在全国6省24个县进行了调查，其中包括内蒙古、云南、吉林3省的7个民族聚居县。本期刊登吉林省安图县调查报告的部分内容，供各位同行交流参考。

安图县教育发展状况（节选）

于长江

一、概况

安图县位于吉林省东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南部，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安图县境内早在旧石器晚期即有人居住，周代以后，秦、汉、隋、唐、辽、金、元历朝，该地均归属一定的行政机构管辖。明代，这里土著居民为女真-满族，南部长白山是满族传说中始祖“布库里雍顺”的“发祥圣地”，附近有清太祖努尔哈赤最早建立政权的“赫图阿拉”城。清代，满族统治者为了保护这块“龙兴之地”，于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将兴京以东、伊通州以南、图们江以北疆域实行封禁，县境内人迹渐绝，但仍有零星冒险潜入者。其中有朝鲜贫苦农民，为谋求生存，不顾中、朝两国政府的严厉封禁，冒死越境进入该地。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后，封禁政策有所松动，朝鲜越境私垦者迅速增加，特别是1860—1870年间，朝鲜北部发生前所未有的水灾、旱灾、虫灾，灾民大量涌入。光绪七年（1881年），清朝为了保疆筹边、增加财政收入，废除了禁令，并设立机构招民垦荒，又有许多朝鲜农民应招迁入。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日本兼并朝鲜后，又有一些朝鲜难民、反日人员和失业人口人离开朝鲜，越境进入中国。同时，日本提出所谓“中韩边界问题”，故意误指图们江的源头，把图们江说成另一条河流，进而把图们江以北的中国领土称为朝鲜“间岛地方”，派员管理，并不断扩大其领土要求的范围，甚至把吉林省中部都划归到所谓“西间岛”范围内，借此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清政府为了加强这一带边务，特别是保护图们江国界，开始加强这里的行政管理，并与日本进行了交涉，勘定边界，溯清河流源头，澄清了界河。宣统元年（1909年）组织移民200户到娘娘库（今松江镇），设县治，定县名为“安图”，属奉天省长白府管辖，这是安图县设县之始。

作为一个设置比较晚的县，安图的人口增长速度相对较快，据历史记载，清宣统元年（1909年）设县治时，仅有县民364户，1784人，以后人口迅速增长。1994年常住人口为217768人，



80 多年中增长了 122 倍。

表 1、安图县人口增长情况

年份	户数 (户)	人口数 (人)	人口密度 (人/平方公里)
1909	364	1784	0.17
1911	1138	5271	—
1934	—	16447	2.9
1946	5323	23541	
1953	12790	53674	7.2
1964	22153	105720	14
1982	41872	185256	24.9
1985	46050	194442	26.1
1990			
1991			
1992			
1993	59957	216777	
1994	61111	217768	

资料来源：《安图县志》，《安图县统计年鉴》

1994 年总人口，按照中国的“户口”制度的划分，属于“农业户口”的人口为 112826 人，占人口总数的 51.8%。如果以居住地域划分，乡村人口数为 104833 人，占总人数的 48.2%，少于具有“农业户口”的人数。

安图县人口中有汉族、朝鲜族、满族、回族、蒙古族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民族的人数比例有所不同。

在设县治不久的宣统三年（1911 年），全县人口 5271 人，其中朝鲜族 806 人，占总人口的 15.3%。1934 年，全县有朝鲜族 3058 人，占总人口的 18.6%。到 1949 年，朝鲜族人口增至 26654 人，占总人口的 51.7%，超过了汉族人口。1953 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汉族人口为 20793，占总人口的 38.74%；朝鲜族人口 31721 人，占总人口的 59.1%，满族占总人口的 1.89%，回族占 0.24%。到 1964 年第 2 次人口普查时，汉族人数增至 54939 人，占总人口 51.97%，朝鲜族 49415 人，占总人口 46.74%，其余为满族等。1982 年第 3 次人口普查时，汉族人口 130560 人，占 70.43%，朝鲜族 51739 人，占 27.93%，，其余为满族、回族、蒙古族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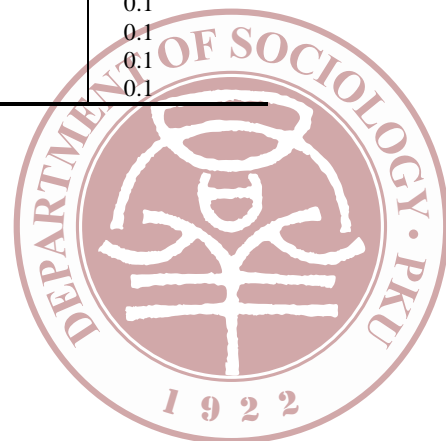
1982 年以后，有一些原来填报“汉族”的人改报“满族”，但汉族人口仍占优势。1990 年后各民族人数比例如下：

表 2、1990—1994 年各民族人口比例

年份	单位：%				
	汉族	朝鲜族	满族	回族	其他民族
1990	72.2	25.3	2.3	0.2	0.1
1991	72.5	24.9	2.3	0.2	0.1
1992	72.8	24.5	2.4	0.2	0.1
1993	73.2	24.0	2.5	0.2	0.1
1994	73.5	23.8	2.4	0.2	0.1

资料来源：《安图县统计年鉴》

二、教育发展的历史



1、清末和民国时期的教育

安图县由于建县治时间较晚，教育事业起步较晚。据现有资料记载，宣统二年（1910年），由地方绅士多人共同倡导，创办瓮石砬子学堂，这是本地最早的教育机构。当时租用民房9间，学生89人，设一班，分甲乙两级。

宣统三年（1911年），安图县政府在娘娘库（今松江镇）创办“安图县学堂”，有讲堂、宿舍、教习堂、厨房、夫役室等7间校舍，招收学生160余人。

据现有记载，最早的私塾教育略迟于学堂的出现，由朝鲜族人士创办。中华民国5年（1916年），崇礼乡（“崇礼” chongli 意为“崇尚礼教”）朝鲜族梁某创办本县境内第一所私塾，塾师也是朝鲜族人，学童24人，每人每年学费3元（日元）。同年，这个乡又开办“改良私塾”，朝鲜族人金某担任塾师，学童43人，塾师年收入100吊。民国17年开始有汉族人开办的私塾，1934年后，先后创办了8所私塾，直到1949年后陆续停办。

小学教育：安图县小学教育始于1911年建立的“第一小学校”，后又陆续建立3所小学。到1930年，全县有小学11所，教员18名。明月沟一带有延吉县立第九、底二十九、第三十小学和倒木沟小学，还有私立小学3所，基督教会小学11所。1944年“光复”前，全县有国民学校32所，国民优级学校9所，其中有些学校的校长、教导员均为日本人。

中学教育：民国17年（1923年），由地方乡绅提倡，政府支持，于县城（今松江）创立“奉天省安图县公立初级中学”，教师2人，学生30名，办学经费由公署公款处开支。民国19年（1930年），第一届学生毕业23名，学校因经费拮据，师资缺乏停办。

除中小学教育外，1934年，基督教会曾在明月沟办过朝鲜族幼儿园（当时称“幼稚园”）。

2、“光复”以后的教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年日本投降，在经过了短期过度性临时政府之后，1946年，共产党军队直接接管安图县，并建立政权，所以，最后“解放”的年代被认为是1946年，而不是中国大陆其他地区的1949年。

从1946年起，政府发动群众办学，至1949年，全县有公立和民办小学22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县政府对小学进行了调整，教学水平低的教师被要求改行转业或被送去进修，学生进行统一考试，调整班级，合班并校，1952年共有小学38所，1955年统计，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84.2%，其中朝鲜族儿童入学率达到98.5%。1958年，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教育部门提出公办、民办相结合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安图县提出普及小学教育的目标，将失学多年的超龄学生动员回校，学生增加，班级超员，师资水平低，教学质量下降。1964年，为了普及小学教育，根据县境内某些地区偏僻多山的特点，开办巡回教学点，使全县儿童入学率达到96.32%。

1945年10月，明月沟群众自筹资金兴办“私立东明中学”和“私立明成女子中学”，同年，两校合并，更名为“私立东城中学”，1946年，石门区小学增设朝鲜族初中班，1947年成立“新民中学”招收汉族学生，同年因学生大量参军参政，学校改为初中补习班。1948年，在县城松江成立“安图县立初级中学”，招收汉族和朝鲜族学生，1949年，该中学随县政府一并迁往明月沟，与私立东城中学合并，定名为“安图县立初级中学”1953年成立汉族分校，1954年汉族分校改为“安图县第一初级中学”，原县立初中改为“安图县第二初级中学”，同时，在4个乡镇小学附设初中班，1958年，安图县第一、二中学增设高中班，万宝小学附设初中班改为万宝中学，同时成立松江中学，至此，安图县教育格局基本形成。

3、“文化大革命”时期



文化大革命时期，教育的指导思想发生变化，“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城镇和乡村学校，领导学校的工作。教员与贫下中农社员进行“对流”，社员到学校任教，教师到社队劳动，同时对中小学进行多次“分”与“合”的调整，小学数量增加到 176 所，在校生 25369 人。教学方法上削弱课堂教学和课本知识，强调通过社会实践学习知识，强调阶级斗争和政治思想教育，即所谓“开门办学”、“走出去，请进来”、“大课堂（社会）与小课堂（教室）相结合”等原则，比较极端的情况有鼓励“造反有理”、“反潮流”，反对“师道尊严”、“智育第一”等活动。

4、1976 年以后的教育

“文革”结束后，学校教育经过了一个所谓“拨乱反正”的时期，以课堂教学为主的教学秩序得到了恢复，统一了课程设置和教材，恢复了文革前的学制，但由于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教学管理和内容不可能恢复到“文革”前的状态，而要适应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的社会背景。针对当时学生基础知识较差的状况，学校在教学内容上强调“双基”，即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针对长期封闭造成的教学方法、设备陈旧落后的问题，各学校注重购买或自制了幻灯机等“现代化”教具，并引进许多新式教学法。

文革后，政府开始所谓“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县政府成立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办公室”，经过几年努力，将在 1957 年“反右斗争”中“错划”的 38 名右派分子摘掉“右派帽子”，并安排工作，平反了“文革”中造成的冤假错案 86 件，受株连者也得到安置。同时，在县人民代表大会中安排了教师代表，以示提高教师的政治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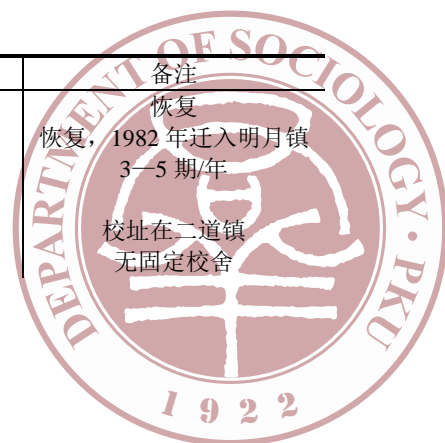
政府几次提高教师工资，教师进修学校举办各种脱产学习班，民办教师大部分转为公办教师或代课教师。

这一时期教育工作最主要的一项发展，是高考制度的恢复。由于这种决定许多人终身命运的考试制度在遭到破坏之后有重新开始运行，人们出于一种对文革中无序状态的反弹，开始狂热地追求高考，形成了持续几年的“大学热”，这一时期正是教育事业恢复发展的时期，所以“文革”后的教育从一开始就受到高考导向的严重影响，造成了以应接考试为目的的“应试教育”和以“拿文凭”为目的的“文凭教育”，这些倾向愈演愈烈，使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走上歧途。到 80 年代后期，由于整个社会经济环境发生变化，除少数尖子学生之外，人们（尤其是农村人口）接受应试教育的热情普遍下降，但已经形成的教育体制和内容设计仍以应试教育为指导思想，这种教育与现实需要脱节的现象，是造成人们受教育动机缺乏的一个重要原因。

文凭教育导致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各种部门专业学校的恢复和兴起。这项发展本来的目的在于补普通教育发展之不足，但以此为名义，很快演化为各部门各系统为自己的干部获取文凭、为自己子女安排工作的一条捷径，因而这些教育形式急剧膨胀，以至于出现与后来正规职业教育争生源、争资金等问题。在 1976—1985 年间，先后出现各类学校 10 所。

表 4 非普通教育学校

学校名称	创办或恢复时间	当时学生数(人)	备注
安图县农业高中	1983 年	23	恢复
安图县卫生学校	1970 年		恢复，1982 年迁入明月镇
安图县农业机械化学学校	1978 年	80	3—5 期/年
安图县粮食职工学校	1981 年		
吉林省林业技术学校白河分校	1983 年	104	校址在二道镇
吉林省广播电视大学安图县管理站	1982 年	13	无固定校舍



农民夜校（37所）	1978年	1300	恢复
中央农业广播学校安图县分校	1981年	225	
职工业余教育学校	1981年		恢复
安图县业余体育学校	1971年		恢复

资料来源：《安图县志》

文革结束后，政治思想教育仍然是教学内容的重要部分，先后进行过“批判‘四人帮’”、“抓纲治国”、“学雷锋，树新风”、“五讲四美三热爱”、“反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等政治教育活动。但这一时期的政治教育，主要以政治课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的形式为主，越来越多地与个人修养、品德教育结合起来，渐渐远离原来意义的纯粹的政治思想教育。“文革”结束至今，学校内没有进行大规模政治运动，没有出现政治教育运动冲击教学工作的情况。

三、教育发展的现状

目前，按照教育部门统计报表和衡量指标，安图县在延边地区居于中等偏上的水平。1994年，安图县小学入学率为100%（高于延边地区平均数99.58%。），巩固率为99.95%，毕业率为99.9%；初中入学率97.8%，巩固率97.58%，毕业率99%。

安图县已于1994年通过了国家“普九”（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验收检查，这样，至少在名义上，安图县已经普及了初中教育。

安图县位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保持朝鲜族自身的文化传统，根据有关法律，朝鲜族学生必须进入“专设朝鲜族学校”或“民族联合学校”中的朝鲜族班，接受朝鲜语言文字教育，目前，全县共有朝鲜族小学和民族联合小学19所，具体情况如下：

表6、朝鲜族小学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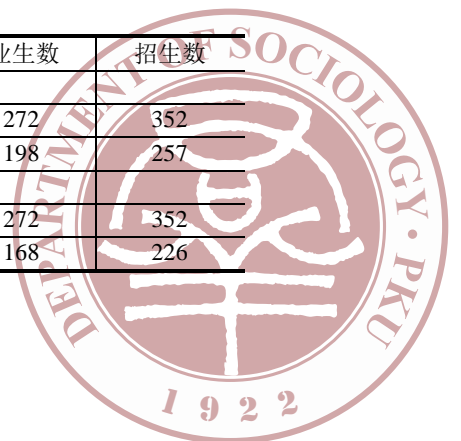
学校类别	学校数	教学点数	班级数	在校生数	毕业生数	招生数
总计						
专设朝小	5	1	60	2373	329	407
民族联校	14	6	107	2341	304	409
教育办						
专设朝小	5	1	60	2373	329	407
民族联校	12	6	95	1980	253	346

资料来源：《安图县教育统计年鉴》

初中中“专设朝鲜族初中”和“民族联合初中”的情况如下：

表7、朝鲜族初中情况

学校类型	学校数	班级数	在校学生数	毕业生数	招生数
总数					
专设朝中	2	21	987	272	352
民族联校	6	25	730	198	257
教育办					
专设朝中	2	21	987	272	352
民族联校	5	22	628	168	226



资料来源：《安图县教育统计年鉴》

专设朝鲜族中学都是由教育部门主办的，6所民族联校中有5所是教育部门主办，县境内非教育部门主办的初中以汉族初中为主。

六、地理、历史对教育的影响

1、地理位置与旅游业

安图县位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南部，其南部长白山地区为中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北朝鲜）的边界，每年都有大量来自中国国内和其它国家的旅游者，外国游客中来自韩国的游客特别多，由于旅游活动，本县某些靠近旅游线路的地区，服务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也形成了一定的就业需求。

但是，这里的旅游业没有刺激起各种跟旅游有关的职业培训和职业教育。其原因在于旅游业没有提高人员素质的要求。具体而言，其一，国内自费游客通常只希望“到过长白山”，照几张相片回去，他们不特别要求旅游服务的规范性和多样性，而只关注价格是否便宜，因此对旅游业没有提高服务质量的要求；其二，国内大量公费游客多为基层干部，以大吃大喝或打麻将等为主要娱乐方式，他们本身就不需要现代意义的各种服务规范和形式；其三，外国游客主要是韩国人，他们来这里，主要是由于长白山在其民间文化传说中有一定地位，同时这里有大量朝鲜族人口聚居，形成民族认同感，因此他们对服务质量并不做过高要求，服务好坏不影响他们的旅游热情；其四，旅游业内部导游、餐饮、住宿等服务人员互相建立了私人关系，互相负责安排客人，不能形成行业内部的竞争，人们不是通过提高服务质量，而是通过给回扣、建立私人关系等手段来保证客源。

由于这些原因，长期以来长白山地区的旅游服务一直停留在相对初级的水平上，服务质量差、服务项目少，仅仅使当地人赚到一些现钱，而没有造成提高服务人员素质的压力，也就不能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安图县的职业教育中，旅游业始终不是重点，这与本地丰富的旅游资源很不相称。

旅游业使得当地人能够比较多地接触到来自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人，这有助于开阔人们的眼界，提高人们的进取心。同时，旅游者的生活方式也对当地青年产生很大影响，促进中学生的分化，有些人更加努力学习，希望将来通过考学，步入社会上层，享受现代生活方式，另一些人放弃学业，急于早一些进入社会“干一番事业”，同样达到享受现代生活的目的。

大量韩国人的出现，提高了本地朝鲜族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自信心，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朝鲜族人接受全面汉语文教育的愿望。

安图县县城几次迁移，造成了明月镇和松江镇2个中心镇，如果再加上交通、旅游和林业的中心二道镇，共有3个人口聚居中心。这种格局，使得安图县比其它的县（如汪清县）人口分布更为均平，地区间的教育发展程度和人口素质差别较小，有利于总体水平的提高。

2、特殊历史环境的影响

（1）历史起源于移民社会，文化基础薄弱。

安图县建制较晚，以前人口稀少，基本上没有什么文化基础。后来大量移民涌入，人口逐步增加，但这些移民大多为文化水准较低的劳动阶层，建县治后，官方和当地乡绅推动了地方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但随即陷入长期的社会动荡之中，社会经济得不到发展，发展教育的基础和条



件一直不太好。

(2) 各种势力角逐，各方面都努力发展教育，“争夺青少年”。

安图县在历史上一直是各种政治势力角逐的地方。清末设县治就是为了抵御日本势力的渗透。后来许多朝鲜反日人士到此，以兴办学校的方式宣传反日思想，结交同志者，由于强烈的民族主义的支持，这些人从事教育工作非常努力，大大推动了本地朝鲜族教育的发展。在伪“满洲国”时期，反日反满志士仍然在此活动，并组织了强有力的武装斗争。“满洲国”政府试图通过教育大肆灌输传统文化，特别是忠君、孝悌等传统观念，以巩固自己的统治，但又不得不听从日本政府的旨意，聘请日本人担当学校领导和教师，在教育内容中大量加入“日满一心一德”等宣传，并大量开设日语、日本历史等课程，极力培养学生的亲日倾向，这种教育，基本上是一种“传统--半殖民地”式的奴化教育，但“满”、日政府为了加强教育效果，也必须引进一些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客观上也有助于教育工作的规范化，提高了古文、日语等基础学科的教学水平。

(3) 位于边境地区，政治教育气氛浓。

共产党力量接管政权后，这里不再存在多种政治力量角逐的局面，但这里一直是政治、军事斗争的前沿地区。在1946-1949年的内战中，共产党在这里进行了有效的战争动员，招兵847人，另组建民兵、自卫队等武装7千多人以及更多的支前人员。在后来的“抗美援朝”（朝鲜战争）时期，又有810人参军。现在，在安图县可以看到不少参战阵亡者的“烈士碑”。在这种强烈的政治军事气氛下，教育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从属于“动员群众”工作，1953年后，情况虽然有所改变，但其影响却很深远。现在担任各部门负责人的人，大多出生于50年代，在50-60年代接受基础教育，当时的政治气氛使这一代人具有某些特殊的知识结构和心理素质，如偏重于政治化的道德教育，习惯于以简单的“两分法”（“是”“非”、“善”“恶”）来思考问题，无法接受和宽容现代人文思想，等等，这些特征，会体现在他们关于教育的具体决策中。

(4) 多民族杂居，有潜在竞争和保持体面心理，促使家长重视子女教育。

居住在安图县的汉、朝鲜、满等民族，总体发展水平基本相同，历史上都是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熏陶的民族，都有强烈的家族观念，注重保持体面和面子，重视子女教育，以教育为正统出路，这些传统，促使人们只要有条件，就要“供”（gong 读如阴平声“工”，意为“努力地以财力物力支持”）子女上学，上学成为保持家庭或家族体面的重要内容。对于不同民族来说，又有一层民族自尊心的影响。不同民族的人在受教育程度、个人素质、成就等方面存在着潜在的竞争心态，谁都不甘居人后，尤其是朝鲜族人，特别不愿在教育方面落后于其它民族。朝鲜族家长们不仅努力“供”子女上学，而且很注意保持子女在学校中的形象，包括举止、穿着打扮等方面，都尽量保持体面。这种动机有利于促进教育发展。

(5) 外来强大压力，无力左右自己命运，听天由命心态，依靠上级。

安图县人经常称自己的县是“经济还不十分发达的农业小县”（引自政府文件），这种称呼，固然有要求上级增加支持的意图，也确实反映了安图县人对自己地方总体发展水平的定位。笔者认为，安图县人口素质其实没有当地人描述的那么低，如果做事态度认真一些，有许多事可以做得更好，但这里民众和干部普遍缺少必要的自信心，凡事总是希望上级或外人来帮助。历史上，这里的民众都来自移民，乡土观念相对淡薄，没有某些古老农业社区“世代代生息繁衍”所造成的根深蒂固的乡土观念。一直受到强大外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力量的左右，始终没有形成相对独立的“地方势力”，加之民族杂居，难以形成以地缘为基础的认同感、自豪感和自信心，人们并不执着地坚持发展本地地方经济，而是倾向于通过各种捷径，如移居其他地区，以求自身



或自己家庭状况的改善。大量朝鲜族人移居其它地区就是一例。这种心态，影响当地的各项发展，包括教育的改进和发展。

七、民族状况对教育的影响

安图县属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境内人口有 73.5%为汉族，23.8%为朝鲜族，其余为满、蒙等民族。从绝对人数上讲，朝鲜族并不占多数，但根据国家现行法律，凡确定为“民族自治地方”的地方，必须实行一系列特殊的“民族政策”，政府方面，行政首脑必须由朝鲜族人担任，政府机关中朝鲜族干部人数比例必须保持在 50%以上；教育方面，必须建立朝鲜族的中学和小学，朝鲜族子女必须入朝鲜中小学，学习朝鲜族语言文字和朝鲜文教材，教育部门中朝鲜族教职工和干部要占半数以上比例，等等。这些规定本来是为了保护朝鲜族的平等权利，保护朝鲜族的文化传统，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有些规定变成了某种障碍。目前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朝鲜族中小生源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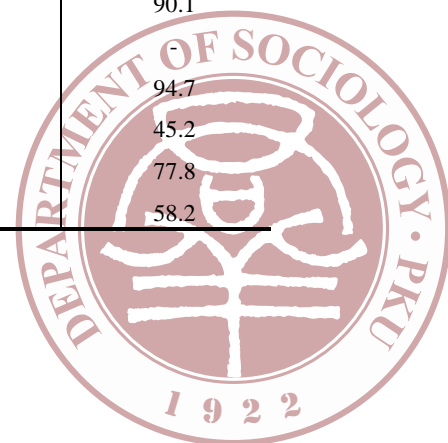
农村人口比例变化，导致朝鲜族儿童数量减少，农村小学生源濒于枯竭。近年来，安图县农村朝鲜族人口利用亲属、朋友关系，大量离开农村，向延吉等朝鲜族聚居的城市地区迁移，因此农村朝鲜族人口急剧下降。由于这种移民属于完全自发移动，没有任何官方统计，所以没有确切数字。至于迁移的原因，根据笔者访谈，人们（包括朝鲜族和汉族）称农村朝鲜族人口生活平均水平“略低于”汉族人口，因此不愿意在农村呆下去，急于迁移到城市中。村民们认为，与汉族人相比，朝鲜族日常生活缺少计划性，不愿意把太多的精力投入到纯生产性活动中，而花在娱乐、交往的时间比较长。笔者认为，这种状况与朝鲜族文化传统有一定关系，也反映了朝鲜族人注重精神满足的性格特点，事实上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如果综合考察精神和物质生活两个方面，农村朝鲜族的生活质量并不低于汉族农民。汉族农民把大量精力投入物质生产，精神、娱乐生活相对单调，综合生活质量不一定高。但是，由于物质生活水平更具可比性，容易被人们注意到，所以才有朝鲜族生活水平略低的印象。

在朝鲜族大量移民的同时，朝鲜族生育率保持在较低水平上，使得儿童数和适龄儿童数下降。根据官方统计，朝鲜族在计划生育方面一直是所谓“先进”。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朝鲜族法定结婚年龄低于汉族，同时，一对朝鲜族夫妇可以生育 2 个子女（一对汉族夫妇只能生育 1 个子女），但事实上，朝鲜族并不利用这一“优惠”政策早婚和多生子女，朝鲜族的实际生育情况与汉族相差无几。

表 8、安图县人口生育情况

	合计	城镇	农村	朝鲜族
计划生育率	98.6	99.2	96.3	100.0
一胎率	95.0	96.2	91.7	90.1
多胎率	0.06	0.08	-	
节育率	95.6	95.7	95.3	94.7
独生子女率	64.3	71.3	26.6	45.2
晚婚率	71.6	79.6	52.4	77.8
晚育率	61.1	63.2	53.5	58.2

资料来源：《安图县统计年鉴》



朝鲜族独生子女率达 45.2%，晚婚率为 77.8%，晚育率为 58.2%，这使得近年来朝鲜族儿童数不断减少。每年达到入学年龄的儿童数也呈递减趋势。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朝鲜族人口绝对数都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由于移民和子女数减少的影响，朝鲜族适龄儿童数量减少，造成城乡朝鲜族中小学和民族联校中的朝族班生源不足。在农村，有的村每年只有 1—2 名朝鲜族适龄儿童，有的村已不能保持每年都有适龄儿童，因此，有些村小或民族联校中的朝鲜族班已改为隔年招生，但每班仍不超过 10 人，但是不管学生多少，都要配备同样多的朝鲜族教师，因为这些教师大多为公办教师，有固定的编制和工资定额，不能随便变动，因此，有些村小已形成朝鲜族教师多于学生的情况，有些朝鲜族教师改做其它工作，或任其它课程。在城镇，朝鲜族生源也日趋不足，朝鲜小学的班数和班额不断减少，学校实际规模在缩小，教师比例偏高，学校经费相应地减少。小学的情况直接影响到初中，小学毕业生减少，初中生源自然减少，由此一直延伸到高中。由于人们对朝鲜族学校热情下降，各种支持也相应下降，朝鲜族学校在经费方面也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学校领导和教职员工的总体心态比较消极。

在朝鲜族学校生源减少的同时，有些朝鲜族家长不愿意让子女进朝鲜族学校学习，而设法通过“关系”把子女送进汉族学校，他们认为，子女上朝鲜族学校，将来汉语水平低，找工作困难，不容易发展，不如从小上汉族学校，将来顺利进入社会，会有一个更好的前途。据当地的朝鲜族人说，有这种想法的父母越来越多，甚至已经占有朝鲜族的大部分，这部分人主动愿意让自己子女接受汉语文，但他们并不是希望子女“汉化”。首先，他们把汉语视为社会通用语，不仅仅是“汉族的语言”，所以学习汉语文并不是变成汉族；其次，他们认为“朝鲜文化”就是朝鲜语，朝鲜族学生在学校学习汉语文，但在家中，在日常生活中，仍然说朝鲜语，所以不会丢掉朝鲜文化，而是两全其美。事实上，在汉族中小学上学的朝鲜族学生，民族意识仍然很强，但表现得更为理性。

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朝鲜族人主张继续发展朝鲜族教育，并坚决把子女送入朝鲜族学校，由于没有确切的调查，目前尚不能确定究竟支持哪一种意见的人比较多。

不管怎样，大量朝鲜族人的这种接受汉语文教育的要求，使原来的有关政策法规面临一种两难的困境：原来决策者主要防止的是“大汉族主义”、破坏朝鲜族语言文字，为了避免这类指责，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总是强调尊重朝鲜族文化，保留朝鲜族语言文字，保护朝鲜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等等，所以才规定朝鲜族子女一律上朝鲜族学校，可是现在，情况反过来了，政府要求朝鲜族子女入朝鲜族学校，有些朝鲜族人自己反而希望进汉族学校，于是在政府内部引起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应该取消朝鲜族学校，所有儿童都接受汉语文教育；有人认为应该尽力维持朝鲜族教育，设法动员吸引朝鲜族儿童入学；有人认为应该任其自然，由学生和家自由选择上什么学校。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最坚决主张维持民族教育的人恰恰是汉族干部，除了一般意义的民族平等意识之外，也可能有心理方面的原因。汉族干部特别不愿意被指责为“大汉族主义”，所以特别支持朝鲜族教育的，这样在政治上更稳健。

对于“任其自然”的观点，县乡政府部门中有不少人反对，这些人从政策角度考虑，认为放任自流等于否定了国家“大力发展民族教育”的基本政策取向，可能会引起“指导思想的混乱”，为那些反对发展民族教育的人提供借口，否定必要的民族教育，甚至有可能破坏民族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担心是完全有理由的。由于中国行政官僚机构特有的素质和机制，下级干部为



了讨好上级，总是有一种盲目赞扬、强化上级某种意图的倾向，所以很多本来温和的、有条件的政策在执行中往往被推向极端，变成一种无条件的、不顾实际情况的命令或社会势力。“发展民族教育”做为一项基本方针，不能有丝毫动摇的余地，如果出现某种可能被误解为“该方针可以动摇”的举措，人们就会对这一方针丧失信心，造成一系列有关政策的崩溃。

在朝鲜族人口中，对于保留文化传统问题，也有不同的情况。除了上文中提到的那种“既接受汉语文教育，又保持朝鲜族文化”的想法之外，也有一些人认为，只要个人有前途，无所谓哪一种民族文化。另一方面极端的观点是，必须无条件地保持朝鲜族文化，宁可牺牲一部分个人的世俗成功。

直到现在，官方政策（严格地说是延边自治州的政策）仍然是朝鲜族儿童必须入朝鲜族学校，因此，那些想把子女送入汉族学校的家长，就必须设法打破这一限制，最常用的办法是通过转学，因为按照规定，跨县转学的学生可以不分民族，直接进入汉族学校，所以有些朝鲜族家长先让子女入朝鲜族学校，再转到其它县某一中学，然后再转回本县，进入一所汉族学校。在这一过程中，有几个环节要通过一些“关系”，所以不是人人都能做到。

安图县少数民族人口的存在，也从统计意义上影响着县境内人口的“受教育水平”。由于朝鲜族学校、民族联校的存在，需要一部分从事朝鲜语教学的教师，因此政府给定的教师编制要多于非朝鲜族学校，因此，相对于同样数量的学生或人口，安图县教师编制总数要多于一般的汉族县，而教师的受教育程度通常又比较高，所以教师越多，从统计上看，人口的平均文化水准也就越高。

通 告

经本人申请，由本会会员介绍，本研究会理事会经研究决定，批准下列申请人为中国社会学会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会员（顺序无先后）：

杨国才 云南民族学院	650031	向跃平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650032
和钟华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650032	韦东超 中南民族学院民研所	430074
乔亨瑞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650032	王奎正 中南民族学院民族学系	430074
张 洁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650032	柏贵喜 中南民族学院民族学系	430074
赵 群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650032	窦学诚 甘肃农业大学农学系	730070
杨士杰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650032	靳 薇 中央党校民族理论研究所	100091
李立刚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650032	蓝达居 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	361005
赵 捷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650032	梁茂春 广西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530022

本学会理事会、秘书处代表全体会员对新会员入会表示诚挚欢迎，希望今后彼此加强联系，互相提携，共同促进我国民族社会学事业的发展。

联系地址：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秘书处

本期责任编辑：于长江
邮 编：100871

